

# 旧迹有情应识我

## ——启功先生与碑帖收藏

唐吟方

2017年年底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“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”，媒体用“启先生的宝贝”来形容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碑帖。

启先生生前，他在碑帖研究方面的造诣为鉴定家、古典文学学者、书画家等头衔所掩，只有文博界少数与他交往的人士才知道，当年徐邦达把自己的弟子王连起送到启功那里，就是要弟子向启先生学习碑帖鉴定。

启功与古代碑帖打交道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。1981年版《启功丛稿》（中华书局）收录的论文中谈碑帖的文字，采用的例证多与碑帖有关，可见他对中国古代理碑帖之熟悉程度。1960年代至1980年代发表的《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》《从河南南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》《说“千字文”》等谈碑帖的文章，既是他研究的趣向，也是他利用碑帖资料从事研究的直接证据。他在《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》里说：碑帖资料有助于不同版本的校勘，有助于补充集外诗文资料，有助于历史人物史实的考证，有助于艺术史的深入研究。黄苗子曾将启功的碑帖研究内容概括为“从碑帖的流传经过，某碑到某一朝代后缺某字，其后又缺某字，翻刻、伪造本与真本的区别”，大致勾勒了启功碑帖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路径，着眼于碑帖的正本清源以及流传过程中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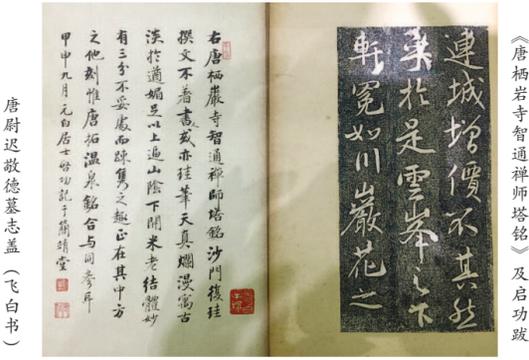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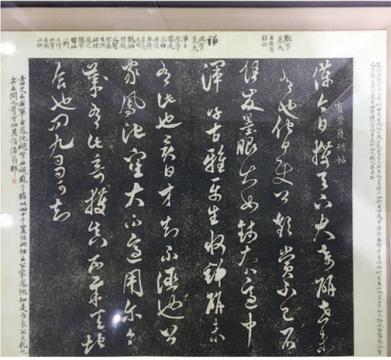
碑帖研究除了历代留下来的文献，无法跳过最关键的实物，这大概是启功收集碑帖的真正原因。他的碑帖收藏与古董家追名射利的收藏不同，重在碑帖在研究环节中的作用。循着这个线索去看启功的碑帖收藏，似乎每一张拓片背后都有说不尽的故事。

启先生收藏的《清八大山人法帖》，是传世罕见的孤本。其中的《爱梅述》《酒德颂》《瓮颂》带有黄庭坚的痕迹，属于八大早期书作，与后来成熟的八大不同，而且《邵陵七夕文》成熟已见八大体的规模。在当时的古玩界，像《清八大山人法帖》那样的墨拓无人重视，启功不抱成见，从研究艺术史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，“八大学”兴起后，这部法帖被多位学者看好，再加黄苗子、王方宇的考证，这部法帖更扬名艺术界，其中的一幅书迹图片屡屡被揭载于书刊，孤本一跃成为人们熟知的八大经典书迹。

还有一个典型例子，是启功对于米芾的偏爱，他尽自己最大努力，收集各种能收集到的米芾碑帖。

《淮山避暑杂咏残石》是传世少见的一件米书拓本。启功在标题旁随手记下“李孟东兄所赠。原石末知在何处？今更不知已毁否？四诗俱不见《英光集》，亦不见《山林集拾遗》。”看来，因为是失载的米芾诗作，拓本才受到启功的重视。

《清八大山人法帖》与《米芾淮山避暑杂咏残石》这两个拓本，都与一个人有关，那就是碑帖鉴定家李孟东。李孟东（1913—？）河北衡水人，号馨砚叟。学徒出身，曾在琉璃厂东街开设“二孟斋”古玩店，与刘九庵、苏庚春、王大山并称为“琉璃厂四大鉴定家”。公私合营后进入北京工艺品公司，其后在北京文物商店工作，是北京市文物局鉴定组成员，书法以章草著称。启先生



关于李泌，我的最早印象是他对唐肃宗说的“五不可留”，即“臣遇陛下太早，陛下任臣太重，宠臣太深，臣功太高，亦太奇”。当时我的感觉，就是李泌懂得见好就收。倘若迷恋这五个“太”而不知“收”，事情就会悄悄发生变化。周围的环境会变，信任会变成猜疑，拥戴会变成妒忌；自己的心态也会变，功能使人变骄，权会使人变蛮，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，以至像李斯那样，想当平民百姓而不得。

读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，方知李泌并不像张良那么洒脱。离开唐肃宗只为建宁王李倓的冤案，估计张良还会对广平王李豫下手，离去之前特以《黄台瓜事》暗示李亨不要再作“摘瓜”之事。虽然当时也有从此不想再在帝王身边的念头，但日后无论是唐代宗即位还是唐德宗即位，他都奉诏而往，尽力辅佐，鞠躬尽瘁。李泌为相，有名有实的只在他去世前的两年。他与唐德宗约法三章，唐德宗要李泌“慎勿报仇”，李泌要唐德宗“勿害大功”，特别是这一点就不同凡响。那时不少藩镇的兵变，往往就由君臣相疑引发，吐蕃也正在做着离间唐德宗与李晟、马燧关系之事。故连唐德宗亦称此乃“社稷之计”。当然，李泌为相其实不只这两年，恰如唐德宗对他所说的：“凡相者，必委以政事……如肃宗、代宗之任卿，虽不受其名，乃真相耳，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。肃宗、代宗之任卿”，当然知道他自己

正式任命李泌为“平章事”之前的那些年，李泌做的何尝不是“真相”之事。革除长年积累的弊政，改变周边关系的格局，支持唐德宗恢复府兵制，奏请解决藩镇州县官吏违规聚敛的问题，单枪匹马地去陝州化解兵患，如此等等，肃宗、代宗、德宗三代的宰相，或许只有陆贽一人尚能与李泌比肩。

然而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司马光对李泌的评价似乎不高。

唐德宗曾对李泌叫苦，说“每岁诸道贡献”之款，已由五十万缗下降到三十万缗。还说他也不知道说这些话不得体，但实在不应该对“宫中用度”。李泌对他说“古者天子不私求财”，“宫中用度”可由我宰相调拨“岁贡”百万缗，有特殊用途还可“降敕折税”，却千万不要再接受甚至索取“诸道贡献”。这个意见唐德宗是“从之”的，却又言而无信，依然有所“宣索”，甚至敕令诸道“勿令宰相知”。得知此事，李泌“惆怅而不敢言”。司马光却将这笔账挂在李泌身上，认为李泌调拨的那笔岁贡，是“欲弭德宗之欲而非其私财”，

# 李泌和柳泌

宋志坚

继而又将此事上升为李泌“相之者非其道”。窃以为如此评价李泌有欠公道。宰相调拨或“降敕折税”多少都有一个准数，而且都是明的，接受甚至索取“诸道贡献”却是无底洞，且在暗中进行，属于“暗箱操作”，很容易使奸吏上下其手，“因缘诛剥”。司马光既知“王者以天下为家，天下之财皆其有”，作为宰相的李泌还能断绝“宫中用度”？像李泌那样向唐德宗提出“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”的举世并无第二人，怎能把唐德宗的言而无信归咎于他？

司马光非议李泌的还有一条，是李泌“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，故为世所轻”。但在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中，除了李泌归隐，李泌奉道，李泌曾居蓬莱书院，我并未发现李泌“好谈神仙诡诞”的例证，恰恰相反，李泌不言“神仙诡诞”的倒有两例。

其一，当时咸阳有人上言，说他看到秦代名将白起死了，还说白起请陛下准他“捍御西陲”，此所谓“活见鬼”，但因为刚好碰上吐蕃兵被边将打退，唐德宗就以为真是白起显灵了，竟“欲于京

城立庙，赠司徒”。李泌犯颜直谏：“臣闻‘国将兴，听于人’，今将师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，臣恐大臣解体矣！若立庙京城，盛为祈祷，流闻四方，将长巫风。”打退吐蕃，功归白起，令边将齿寒心冷；京城立庙祭祀白起，使巫风“流闻四方”。他明明白白摆出来的是“好谈神仙诡诞”的这两大恶果。

其二，李泌以“建中之乱”说奸相卢杞的危害，唐德宗为卢杞辩护：“建中之乱，木土豫请城奉天，此盖天命，非杞所能致也。”唐德宗所说的“木土”，是“好谈神仙诡诞”的，李泌不信这个邪。他知道“建中之乱”非因“天命”而因“人事”，且与唐德宗宠信卢杞直接相关：“杞以私隙除杨炎，挤颜真卿于死地，激李怀光使叛”，倘若唐德宗有所警觉，“岂有建中之乱”？故李泌说：“天命，他人皆可以言之，惟君相不可言。盖君相所以造命也。若言命，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。”他还针对对王的我生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说：“此商之所以亡也！”

唐玄宗时倒是有过一个“好谈神仙诡诞”的“山人”，姓柳名泌。那时平定准西之乱不久，唐玄宗日渐骄奢，宠信能使他有顺适之快的皇甫嵩等小人，并且“好神仙，诏天下求方士”，追求长生不老。原那岳观察使李道古“以贪暴闻，恐终获罪”，想通过皇甫嵩推荐柳泌“自媚于上”，说他“能合长生药”。唐玄宗就命他在兴唐观炼药。这位“山人”不甘寂寞，上言：“天台山神仙所聚，多灵草，臣虽知之，力不能

致，诚得为彼长吏，庶几可求。”这是伸手向唐宪宗要官的，理由是只有让他主政台州，方才能为唐宪宗弄到长生不老之仙药。于是唐宪宗命柳泌且代理台州刺史，开创了方士“临民赋政”的先例。但我想，以司马光之睿智，不会将李泌和柳泌混为一谈罢，此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格调、不在一个档次。

说李泌“建中神仙诡诞”很难立足，说李泌“为世所轻”也不是事实。史上给予李泌以很高评价的不乏其人。唐人柳珣称：“两京复，泌谋居多，其功乃大于鲁连、范蠡”；唐人阳城称：“邨侯（即李泌）经邦纬俗之谟，立言垂世之誉，独善兼济之略”。宋人秦观称：“唐室方镇之患，至于百有余年而不能解者，其弊盖始于天宝之际，肃宗不用李泌之谋，先取范阳而已”；范祖禹称：“李泌善处父子兄弟之间，故能以其真诚直言感悟人主，卒使父子如初，可谓忠矣。”南宋罗大经还将李泌与伊尹、傅说、姜尚、严陵、诸葛亮并称为“皆为世间做得些事”的出山隐士。菲薄李泌的自然也有，却不可泛称“为世所轻”，最多也只是为若干修史的儒者所轻，司马光即在其中，却免不了有独尊儒术的色彩与门户之见的嫌疑。

李泌神仙般的飘逸，大多表现于淡漠名利，以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为座右铭的“儒儒也未必都能做到。从李泌致于“礼乐刑政”的言行看，他也不刻意排斥儒家学说，谏阻唐德宗为白起立庙赠爵时所引的“国将兴，听于人”，就出自儒家经典。

九十年代艺术市场出现的最好的一个本子。启先生论书绝句第九首就是写虞世南，简注里说：“虞书以庙堂碑为最雄赫，原石久亡，所见以陝本为多。然摹手于虞书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与唐石残本相校，其失真立见。城武摹刻本，不知出谁手，以校唐石，实为近似，惜其石面捶磨过甚，间架仅存，而笔划过细，形同枯骨矣。唐石本庙堂碑，影印流传甚广，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。”简注把三个本子的虞氏《夫子庙堂碑》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。此诗是启功二十余岁时写的，晚年买下虞氏西安本、城武本《夫子庙堂碑》拓本，或许和青年时代对虞书的感情有关。

启功的有些碑帖收藏，内容可以当掌故看。那件宋蔡京书写的“面壁之塔”拓本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拓，就书法而言，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，字写得如一团面，圆圆乎乎的，既不见紧收中宫，也毫无遒纵之势，说唐说魏都靠不上，可能是出自蔡京之手的缘故，才被人重视。说明牌告诉观众，启先生收藏蔡京这件大字拓本，缘于与沈尹默先生的交往：沈先生喜欢蔡京的字，私下常常拿来临摹，但蔡京名声不佳，所以沈先生在临蔡书时，旁边必放一本《集圣教序》，遇客来，将王书盖于蔡书之上。我揣测，启功当时收藏蔡京的这张拓片，是为来日写沈氏事迹时所用，但后来因为无穷无尽的应酬，再没有精力去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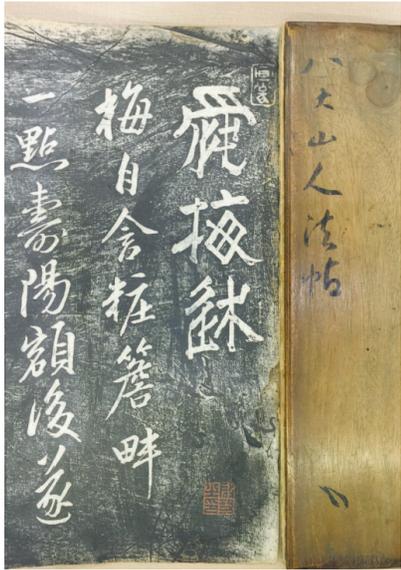
黄苗子、吴小如、傅熹年等学者都提到他们到小乘巷启功寓舍品鉴碑帖的情景，启先生在题跋文字里也屡屡记录与同道凭几研讨碑帖之乐。出入简靖堂的还有碑帖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，如今也步入暮年的王靖完、王连起、孟宪钧等等。

启功一生与石墨有缘，过眼碑帖无数，写在碑帖上的题跋不计其数，寄托其金石情缘，是兴趣研究，也是学问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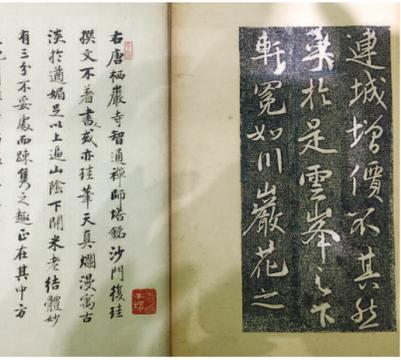
按传统的品评标准，启功大约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碑帖收藏家。

# 笔会

启功旧藏碑帖



清八大山人法帖



《唐尉迟敬德墓志盖》及启功跋

# 愿意认错的高人

顾农

最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介绍著名学者、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公开订正自己论著中的一个错误，文章说：“人们为裘先生叫好，既表达了对老先生自我批评精神的敬佩，也透露出对健康学术批评生态的渴盼。”（杜羽《多一些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纯粹》）

裘先生是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一大权威，不仅学问高，风格也高。同他的高风亮节形成对比的是，据说有些学者不仅从来不肯做自我批评，即使明显出错被别人批评一下，也会大光其火，跳将起来。老虎屁股摸不得，有时连猫也是摸不得的。

其实人非神圣，孰能无错。鲁迅先生自是一流高手，却也曾出过几次错：有一次引用古人之诗，仅凭记忆，张冠李戴；有一次将自己的旧体诗写成条幅赠人，用于纪念年，弄错了一年；又有一次提到一位当代人物，因为误信传言，说其人已成“古人”也就是已经去世了，而其人家活得好好的……一旦发现，他总是立即认错订正，批评自己，态度坦诚，用词毫不留情甚至相当锋利。至于在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中，出点错，概率更是比较大的。

一个人进步最快的不是小时候；从什么都不会、不懂，不过几年功夫，走路，说话，吃饭……就全会了，也懂得不少道理。原因无非是认真听大人说话，有错就改。小学生做作业，订正错误，从不打折扣。中学生、大学生、研究生，大抵也没有不听老师批评的。所以这时进步也很快。如果他自以为是的，一遇批评便跳将起来，有错不肯改，那他就完了。

可惜等到了有了相当的年纪、头衔和地位以后，肯认错并加以改正的好习惯，就不免要打个折扣，甚至荡然无存，于是进步也就慢了。幸而仍有认错的高人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裘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但没有给我们文学专业上过课，平时也没有什么接触。在北大青年教师宿舍楼里，我听到过一次他在洗衣房里边洗衣服边唱京剧现代戏的一个唱段，浑厚高亢，不同凡响，正在同我聊天的留校高班学长介绍说：“这是老裘，他嗓子真好。”印象更深的还是1967年，我们已经读完五年而且又“留校闹革命”闹了一年，仍然走不了，大家都有点慌神了，稍后听说可以领到工资——那时给我们发钱的是正裘老师。他非常准时、准确，把一叠叠钱分发给我们时，一定要我们当面点清，“别弄错了！”态度相当严肃，像是要我们做一份什么作业似的。他从没有发错过。那时按周总理的指示，给我们这种史无前例的“大七”学生发的工资是每月四六元整，同“文革”前大学毕业生工作后转正前的待遇一样了。

我们领了大半年这样的工资，终于得以走出“庙小神灵大”的母校，到广阔天地里去了。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裘老师，中间听说他走出北大去了复旦——到最近又得知他的嗓音仍然高亢，不同凡响。岁月不居，不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。

